

屈原賦校註

姜亮夫校註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东 四 条 街 同 4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607 字数 284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张 $19\frac{1}{4}$ 插页 3

195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 册

定价 (¥) 2.10 元



屈 原 像

序言

千餘年來對於先秦古籍的研究與整理，不爲寂寞！成就也頗有可觀。但時代之進展，並未使一切問題都得到確切的解決；有的反而糾紛愈多。其中也有必然不可避免的原因：如新材料的發現，往往推翻一切舊說；新理解的認識，也可能修正舊的錯誤。所以研究工作，始終不會停止。但有些問題，雖有新材料新理解，也未必能斷定是非，求得真像；雖無新材料，也未必不能作基本的整理。這其中往往只是一個方法應用的當否問題，爲其主要原因。這方法應用的當否問題是什麼？我以爲基本上只是一個主客觀之別的問題：凡是犯了純主觀毛病的人，往往視其個人成分，定其整理的方法與態度：『經生以義例說之，文士以中情會之，史家銜其博證，小學通其訓詁，自漢儒以來千百家，辯者各操其術，以爲一割』。熱情一點的，是把古籍來寄託自己的塊壘，六經當自己的注脚；冷靜一點的，把古籍來作個人『學力』的

測驗與表現，乃至私學的煽動宣傳。很少能做到從一書一人之作中去深思博辨，客觀的邃密的全盤關合的來尋求一書一人之作的真像。這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前後多少認識了歷來整理古籍的弊病，所得到的一點見解。到一九二八年左右，我提了一個整理古籍的口號是：

『個別分析，綜合理解』

八個大字。但當時正迷戀乾嘉諸老一套工夫，這八個字雖慮之至熟，至於運用，仍不敢冒進，只是非常謹慎地在個人使用着。一直到一九三八年，整理瀛涯敦煌韻輯一書時，因僻居下邑，無參考書供我拉扯，才依靠此一法爲整理方法。但在一九二八年左右，我整理詩騷聯綿字考一稿^{此稿成于一九二七年}得到啓示，始爲楚辭作校注；在河南大學講授時，即以此爲教本。到一九三二年寫定，我的主旨只想求得一個『近真』的屈子、『近真』的版本、『近真』的解說，如此而已。現在借出版的機會，把大旨略略說明如下。

一 屈原身世問題

作者屈原的身世、思想等，關係作品很大。除了史記一篇傳記外，只有漢人文中的一些傳說，如淮南王安、司馬遷、劉向、揚雄、班固、賈逵下至王充、應劭諸人。大半都與贊歎離騷一文的美妙結合著說的，所以材料並不算多。後來沈亞之一篇神話故事般的傳，很不可靠。我當時即從屈子作品中，細意搜尋，把凡有關的材料，一一摘出，以與戰國前後先秦兩漢的文獻，排比推校，作了一些個別的分析，如楚文化考、分官制、宗教、民族、藝術、風俗等篇、屈子家世事輯、屈子遊踪圖、屈子交遊考、屈子天道觀、屈子思想分析、屈子的愛國思想等單篇。所得結果，覺得近世學人所懷疑的屈原列傳，却是一篇很可寶貴的材料。又根據上面諸文，個別分析，參以文章的組織，來說明使後人致誤致疑各點，綜合爲屈原傳疏證與屈子年表兩文，旨在求得屈子之真。而以此爲骨幹，來推斷每篇作品，似乎比較順暢自然，無拉雜併轡之弊。

二 版本問題

屈原賦久已是西漢詩賦家誦習的作品。但結集成爲別集，究始於何時？

已不可知。大概淮南王安與梁園諸賦家，是很可能的人。再早一點，漢武帝建藏書之策，也許已有編排。然而至遲不會在成帝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之後，必已校定專集。所以七略裏已明列屈原賦二十五篇，及唐勒、宋玉賦各若干篇。西漢一代的文學主流是詩賦，詩賦已爲文人進身之階，而楚辭更爲國家所重視，召淮南王安作離騷傳不用說，宣帝時還特別徵能爲楚辭的九江被公。召見誦讀，則不僅文集已定，而音讀也別有方法。到了後漢校書郎王逸，集屈原以下迄於劉向，逸又自爲一篇，並敘而注之。這正是今天尚存的最古的本子，也是唯一的本子。

此外，音讀方法：在漢有九江被公，到隋有釋道鸞，『集則誦讀聲調亦有專書，今已不傳。惟驚公楚辭音，我在巴黎抄到一個殘卷，只有音讀，不見聲調，已散入本書之中。』

經過魏晉六朝到唐，雖也有人誦習，但這是一個中衰時期，一直要到晁補之、洪興祖、朱熹諸人，此學又復大興於世。而三家之書，也幸而傳到現在。所以除王本外，還有晁氏重編本，洪興祖補注本，朱熹集注本；而洪本參照的版本爲最多。此外自漢以來文人作品裏，注家注釋裏，類書裏，引用楚辭

的地方，可真不少。當一九二八年前後，我正校尙書時，摘錄各書引尙書文句，也把楚辭文句別錄成冊，一面在南京圖書館、上海東方圖書館、最後是河大圖書館等處，用明翻宋本、明本的章句、補注等十二三種，合以諸書所引，細爲校勘。這是整理古籍必然要經過的工作。發見了不少可貴的材料，訂正不少的譌誤。把這個校勘所得，結合到文義訓詁的解釋上去，多少有些『近真』的發見。但這個真，至多只恢復到六朝魏晉之真；距七略、距屈子原本，應當還遠！

三 章句大義問題

章句大義，是注釋楚辭最重要也是最後的目的。但此事也正是糾紛之所在，也是歷來研究者集中的地方。譬如王逸分離騷爲經，九歌以下爲傳，這是漢代經生的結習。廖先生^平一定要說離騷是秦始皇的仙真人詩，這是經今文家的異說。班固一定要說『露才揚己，忿懣亡身，多稱虛無之語，皆非法度之政，經義所載』。顏之推一定要說『常陷輕薄』。劉知幾一定要說『不

『隱君惡』。都是有所蔽。明代以後，一直到姚鼐、吳汝綸諸人，又以詞章家的批點，來講楚辭，更覺離屈原本義益遠。朱熹有一段批評王逸、洪興祖諸人之不當的話，似可移作幾千年來的總評：

至其大義，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，嗟嘆詠歌，以尋其文詞旨意之所出，而遽欲取喻立說，曲引旁證，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。是以迂滯而遠於性情，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，使原之所爲，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，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！

用這來指出千餘年來研究屈原賦的缺點，是非常正確的。但是回頭來看看朱熹的集注，也不能無蔽；他還是以儒家義理，來衡論解釋屈原。對此問題，我當初也個別作了一些工夫，除在上文說到的諸文中料理此事而外，我又作楚學考以明證屈學的本末源流，然後綜合屈子身世、文法分析、與戰國一切民族、歷史條件，客觀地精細地周徧地來處理每一句每一篇的大義，以求合於他所反映的社會意識、歷史事實、與詩人特有的感觸，以求得作品大義之

真！

四 歷史問題

屈原賦除九歌而外，每篇都援用許多歷史材料，以充實證驗屈子自己的理論，或他想像中的境界。再加上天問一篇所發的百七八十個問題，更是點滴與歷史相關。所以歷史材料的應用，成了屈原創作的最大特色，也是糾紛所在之地。但古史的材料，秦漢以來，日漸亡佚，自漢武表彰六經以後，凡非縉紳先生之言，都認為不雅馴，於是史學家都要『考信於六藝』。屈子既已被人『儒化』，於是他所傳的古史異說，就不能不牽強傳會，要一歸於儒。因而小則影響到文句中的解釋，大則影響到屈原創作的本旨大義，這也是使楚辭紛亂的原因。其實春秋以前所傳的古史，莫不帶上些地方色彩；一定用魯與三晉之說，來衡論齊楚，必然要大錯。魯與三晉的史料，大半經過儒家一派人的整理，其實真像埋沒的很多。南楚所傳的古史，未經過任何學派的整理，亦自存其特有之真。所以研究古史，我一向主張：『當分別地域以求其

異；不當混一東西南北，以求其同』。但千餘年的注釋楚辭者，惟恐其不同！這多少是損害了屈賦之真的一個原因。因之我在楚學考中，特別分析一下南楚諸家對古史傳說的相類似的方向；又從全部屈子作品中，一一歸納其系統，而與莊子、列子、山海經等書作比，成屈子所傳古史考。這有助於屈文的了解是很大的。譬如他所傳的鯀，只不過婁直，夏啓不一定是賢君。這一問題的從新闡明，再綜合其他方面，以說屈賦，是有其怡然理順之處的。

五 文法訓詁的問題

朱熹說：

又皆未嘗沈潛反復，嗟嘆詠歌，以尋其文詞旨意之所出。

這說到了千餘年來研究屈賦的人的懶墮情態，不肯在本文上去用工夫。但是我以爲單靠『沈潛反復嗟嘆詠歌以尋文意』仍不夠，而且也不科學。何以呢？楚辭在文學發展史上有其外在的因素，也有其內在的因素。若不了解當時的內外因素，單靠沈潛詠歌，仍會犯主觀主義的。譬如屈賦的音律、語法，乃

至于韻味等，必然有其地方色彩，而不能與三百篇全部同論。再加作家個人的習慣性行等條件，則在同一地域中，又各有其特殊現象；簡單靠一個『沈潛嗟嘆』，是說不出文旨的。譬如九歌一篇，有些人喜歡說不是屈子作品。

但我從文法上指出屈子作品的地方性與個性，從用韻上指出屈子的習慣性，而斷其必爲屈子修潤楚民族之作，以申朱熹之義，便是一個好例。所以文法研究，也應屬於個別研究分析中的重要之圖。所以我在當時，也下了幾種工夫，寫成了楚辭釋例、章、分字、句、篇等篇、楚辭韻例、楚語言與歌詩、楚方言考等文，然後綜合應用到注釋中去，多少也解決些問題。

上面這五種個別分析，其中又各有再小的個別分析，綜合起來，理解作家與作品，就此求得『近真』的屈原、『近真』的屈原作品的解釋，是我當時的主旨。做到了幾分，我不敢說。我的學力很淺，還有許多問題，到今天也未解決。我當時還未深治金文，所以楚器的材料，仍多未用進去。但我這番整理、校勘、注釋的工作，多少是用謹慎客觀的態度，條理出作者作品『近

真』的面貌，以之作爲更遼密更周徧的研究基礎。現在想來，也是一番必不可少的。上文說到的個別分析工作的一些單篇文章，連同楚辭考（即楚辭書目）等，本來是此書的附錄，一因字數太多，一因還有應修正的地方，只得等病情痊癒後，修正印行。

這部稿子，在當時就是這樣陸續研究、陸續寫、陸續教給學生。大概到一九三一—三二三年左右，全書寫完。此後我患了很重的胃病，遵醫生指示休息，因而暫時去國。到抗戰軍興，我又在東北大學教到這門功課，——此時我百分之九九以上的書籍、稿件，都在上海毀于八·一三之難。託人在河南尋得一份當時的講義，即以之印給東北大學的學生。但在河南印發時，覺得校勘部分對學生無用，所以省去未印。此時自以爲原稿不可能恢復了。到一九四一年父親去世，我回家奔喪，在父親靈柩安葬後，整理他的書桌書箱，發現了這部稿子的初稿，還有一部昭通方言考稿。大概是去國前從河南寄歸向父親請教，父親爲我裝帙起收藏起來的。我既悲傷他之早離我而去，又感謝他爲我保護了這分稿件。一九四二年在雲大講授時，才又漸漸將校文與注文從新配抄起來。但又覺得『宋景之作，氣韻闡緩，蔑屈子之風義，合之有傷其美』。率性把

這部分刪掉，正式題曰屈原賦校注。這些年，雖也偶有補苴修正，但基本未動。年來忙於他種問題的探討，及新學理的研究，而三年來病情嚴重，精力銳減，一切未竟之業，請稍緩時日爲之！

此書在抗戰結束時，第二度與商務印書館定約，第一度是一九三四年去國時。爲我印行；

一九五〇年後，該館專業已變，不能再印文史一類書。近承人民文學出版社允爲印行，而且替我詳細校審，指出一些不妥當的地方，加以修正；編輯部同仁，認爲有寫一篇較詳的大旨與經過的必要。我很慚愧，我這樣一個『鈍根人』，只能用這種笨勁兒，作爲個人整理古籍的方法。這只能說是我熱愛祖國文化的一種表現，不知對人民是否有點滴的用處？一九五四年六月亮夫姜寅清序於杭州六和塔。

凡例

一、今存楚辭，唐以前本，已不可見。

按：敦煌唐寫釋道騷楚辭音，爲今存楚辭最古之本，余得之于巴黎國民圖書館。但全卷不及二百言，其異文已錄入本書校語中。

惟宋洪興祖補注本爲完好，且引用版本最多，故以洪書爲底本。

二、存世洪書，以江南圖書館藏明緡宋本爲最早；本書正文卽據之。

三、洪補引隋唐舊本最多，亦最爲可貴；而朱熹集注引異文，大體出于洪氏。其有增益，當亦唐以來所傳舊籍。朱熹讀書精慎，似無可疑。故本書徵引異文，多以兩書爲主。

四、其他是正文字，所採之書，如史記、文選、錢杲之離騷集傳、慧琳一切經音義等；下及御覽、六帖、類苑諸書，凡有可採，亦皆入錄。皆各于篇中詳之。其文不異者，大半不復徵錄，以省繁重。

五、一九四二年友人聞君一多，以所爲楚辭校補見示，知所據版本，有

爲余所未見者，因亦採其至當于心者二三事補入本書。

六、全書體例，本未純一；偶因新解，遂涉泛濫，實非得已。初本持朱熹考異辯證之例，別附于卷末，以資博涉。繼復自思：兩合雖雜，僅傷于例；離之誠美，未便學人。故一切不分，連類而載。

七、余別有詩騷聯綿字考，已別成專書，故注中但擷要義，不復細錄。

八、楚辭韻讀，爲說至紛。此爲專業，無庸細辯。於不得已，略詳一二。別有專篇，請俟他日刊行。

九、附錄考辯分析之文，及楚辭書目、屈子年表等廿二種，文繁理澀，尚有未愜於懷；故全部抽出，俟修正後，更求正於國人。

十、一九五三年得見端平本朱熹注，因以補校洪本及本書，又錄其異文十餘則。

屈原賦校注卷首

姜亮夫疏證

史記屈原傳疏證

史記列傳卷二十四屈原賈生列傳

按賈生洛陽少年，而深受知于文帝，擢爲大夫。初似屈子之見放。其所謫之地，又適爲屈子生息之所。及其爲賦以弔，則諠亦以屈子自况矣！其學識才力與遭遇，兩人皆有相似之處，而漢代詩賦，實又自賈生開之，故史公合兩人而爲之傳，蓋其宜也。今註屈賦，義當判別，故賈諠一傳，刪而不錄。又原傳中錄懷沙漁父諸文，已別在本書之中，茲亦刪焉。又史記傳本至多，諸刻是非，本無定說。本篇義在徵實，無專校讎。故一以宋黃善夫本爲準，願覽者察焉。

也。今註屈賦，義當判別，故賈諠一傳，刪而不錄。又原傳中錄懷沙漁父諸文，已別在本書之中，茲亦刪焉。又史記傳本至多，諸刻是非，本無定說。本篇義在徵實，無專校讎。故一以宋黃善夫本爲準，願覽者察焉。

屈原者名平，

按公羊昭元年傳：『上平曰原』。說文原作遠：『高平之野人所登』。爾雅釋地：『大野曰平，廣平曰原』。則名平字原，字義相應。又離騷『皇鑒揆予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；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』。正則、靈均，皆屈子化名，而字義亦與『平』『原』相應。又離騷『攝提貞于』